



难以割舍的感情

□ 刘魁立



在我眼里，民间文化比其他艺术形态更具备人类性。譬如剪纸，创造它既需要技巧，也需要加入符号学意义；又如秧歌，既是肢体能力的表现，也是情感的表达。

1979年，我来到北京，在社科院文学所研究民间文化；1980年，我成为社科院文学所民间文学研究室主任。从那时起，我有机会深入观察和了解生活在全国各地的各族人民及他们的文化历史。

感受最深的一次是在西双版纳，我出其不意地参加了一位傣族同胞的新房落成庆贺仪式。民间演唱家“赞哈”们分散地坐在各自的听众中间拿着纸扇遮住脸为大家演唱。过了一段时间又有立灶石的仪式，宾主活跃而激动、虔诚而严肃。回到住宿的竹楼，仍能听见远处狂放不羁的歌声，我因乏至极却难以入眠。一阵无声的雨雨像清风一样拂过，空气是清新的，我的心绪也是清新的。

那一刻，我由衷地感到，他们是我的同胞，我是他们中的一员，把世代创造流传的文化遗产搜集起来加以整理、研究，使其优秀的传统得以继承和发扬，是我肩负的历史责任。

回想自己做过的事儿，我觉得还挺有意义的。假如现在回到60年前，再给我一次挑选专业的机会，我还是会选民俗，因为这份感情已经难以割舍。

吹响“四方风”

□ 陈莹莹

元旦前两天，收到刘魁立老师发来的一封邮件：欣逢元旦，魁立诚邀诸位好友拨冗小聚，赏画品茶，共沐春风。敬请大驾光临。魁立鞠躬。

魁立老师是个有情趣的人。他有时会去报国寺市场搜寻老瓷片。这些年代与产地不一的瓷片是他了解文化与工艺的窗口，他常挑选出几片来当酒杯托，放上小茶盅，连茶叶也沾染了几分古韵。

说一口地道的俄语，爱收藏俄罗斯油画，也喜欢去峨眉酒家吃一顿六块九的早餐；会唱古琴曲，也擅长做红菜汤——作为著名的民俗学家，他的生活有声有色、雅俗共赏，他研究的，本就是老百姓的学问。

魁立老师是个有情的人。他常常遗憾，没能帮助湘西的蓝印花布传承人刘大炮解决房子的问题。后者为了扩大染坊面积，不得不将自己的心爱之物：年轻时与沈从文合作的一件蓝印花布。这件事情每每提起，他都痛心不已。

做了一辈子的田野调查和民间文化研究，魁立老师退休后仍不遗余力地宣传传统文化。民国白话诗人柔石的一首《秋风从西方来了》给了他灵感，四季“静心雅集”火热出炉：春风从东方来了，请品一杯清茗；夏风从南方来了，请赏一束玉英；秋风从西方来了，请聆一缕芳馨；冬风从北方来了，请悟一瓣琴心。

邀请朋友感受茶、花、琴、香“四道”的魅力，他的情趣与情怀，和他钟爱的民间文化一起，传递着中华文化的正能量。

春节前，中国社科出版社约他编一本文集，他打算起名《四方风》。名字的由来是一片甲骨文。不同于绝大多数用作占卜的甲骨文，这块叫做四方风的骨片像叙述诗，诉说着关于风神和四季、天象的神话。

倾其一生，刘老师都在追风、听风、把握风的方向、把风的力量传递给更多的人。热情如他、开朗如他、温暖如他，用自己的笑声和爽朗点亮了属于自己的《四方风》。

采访结束时，他哼起一首古琴曲，“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他皱眉微笑，边唱边站起身来，“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李白的《关山月》，尽显他的风骨。

俗习惯、吉庆活动、故事、儿歌等等的眷恋。这一切融汇在一起，才构成一种乡恋的深厚情感。作为认识人类社会的一门很重要的学科，民俗学包含着民族的自我意识和民族情感，也是爱国主义思想的实际内容。”刘魁立豁然开朗：民俗，原来是一种乡恋。

他深知，只有更深切地理解这种乡恋，才能探寻它能为人们的心灵带来什么。选择了体验式调查的刘魁立，几十年如一日地下乡调研考察。

他去福建看醉龙。壮小伙子们扛着木龙舞蹈，有人负责在人们舞蹈的过程中，拿坛子往每个人的嘴里倒酒。龙舞不歇，舞者纷纷仰头喝酒，酒水哗啦啦洒满了嘴满脸。

刘魁立问一个汗流浹背的舞者：你不累？对方回答：一点不累。

“那一刻，他和他所在的群体、环境以及他心目中的世界，美好而又和谐。”刘魁立说，自己能体会这样的美好，每一次美好的感受都使他终生不忘。

他去象山参加开渔前的祭船头仪式。香案上摆满鱼、肉、水果，唱戏之前先拜妈祖。已不出海的老把式先拜，再是出海的青壮年拜，最后轮到家属拜。

轮到家属的时候，所有守候在旁的妇女争先恐后涌上前去，呼啦一片跪下，祈祷丈夫与儿子平安归来。那一瞬，刘魁立的眼泪湿透手绢。

追风路上，把美好的感受和美丽的乡愁转化为动能，民间文化就能成为人们前进的动力。《刘魁立民俗学论集》、《民间叙事的生命树》、《中国民俗文化丛书》在他的努力下相继问世。

“成名于翻译引进理论，擅长故事学，率先在国内使用共时研究法，引领风气之先的刘魁立是中国民俗学界当之无愧的学术领袖。”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施爱东这样评价。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南通蓝印花布博物馆馆长吴元新心疼刘魁立，“那么大年纪，还不遗余力地奔波各地做调研。”

他说，自己曾问过刘魁立：累么？“一点都不累。”刘魁立给出了和舞者一样的答案。

非遗，朝着心灵的走向

“非遗就像我们小时候喝的母乳，不管后来怎么成长，都依赖于这个底子。”

10年前，吴元新在一次工艺展上初识刘魁立。当时，包括他在内的不少传承人都在思考要不要改行。

展会上，一位长者来到展位，逐一和每个人交流。

“他希望我们坚持下去，他让我相信，国家对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会越来越重视。”吴元新说。临走时老人建议，在传承的同时也要开发更符合市场需求的品类。

这位老人就是刘魁立。

“很多踟躇前行的传承人从他的鞭策和鼓励中获得了温暖和勇气，这是我们继续走下去的巨大动力。”吴元新说。

刘魁立却说，不计其数的传承人，也是他的力量之源。

湘西凤凰，做纸糊狮头和龙头的聂胡子已经好几年招不到徒弟了，他自己上山选竹子，在家剖成竹篾；自己上山采草，削皮做成纸捻。“总不能在别人的手上把湘西的纸活做坏了。”聂胡子告诉刘魁立。

“他们每一个人都有着纯洁而善良的心灵，了解他们的情趣和志向会特别受到熏陶。你会见贤思齐，希望自己也拥有同样美好的心灵，这便是一种民族精神。”刘魁立说，这些传承人的名字烙印在传统之中，他们信奉的精神将带给人支持和激励的力量，他也因此找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

非遗是什么？

“非遗保护，是一种文化自觉。”刘魁立顿了顿，又笑着补充一句，“用描述性的语言来说，非遗就像我们小时候喝的母乳，不管后来怎么成长，都依赖于这个底子。”

口头传统、各种表演、各式工艺、人们关于自然与宇宙的实践……弥漫的、共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于人的头脑中、记忆里、情感上，它关乎我们心灵的走向，推进着人类文明的进程。正是广大民众参与创造并在生活中不断演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让人们增进历史感、激发创造力。

刘魁立找到吴元新，邀请他和女儿在自己主编的《中国民俗文化丛书》中编写《蓝印花布》这一卷。

民俗大家刘魁立

刘魁立，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民俗学会荣誉会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他最早将欧洲民间理论引入中国，并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的故事学理论，在其大力倡导下，中国民俗研究开启了共时研究的学术新景象；他提出的共享性原则及整体性保护原则，已成为非遗保护的基本原则；在他担任中国民俗学会会长期间，他带领民俗学者推动了传统节日与法定节假日的融合。

听风

采风

追风

时光倒回一个甲子，莫斯科郊外的村庄迎来一支民间文学考察队。巨大的风磨下，炎炎如豆的灯光里，人们围坐在民俗歌手旁，听他们用歌声诉说生活。队里的一名中国留学生在日记里写道：我们就像那风磨，收集着风，让它发挥功效。

那一晚，刘魁立和民间文化一生结缘。循随风脚步、聆听风语言、传递风力量的三十年来，他从未停歇。

“老百姓的习俗和文化就像风，来无影去无踪，但人人都可以感受风的喜悦。”老人拢一拢松软飘逸的白发，抿嘴一笑，“于我而言，对民间文化的关注和吸纳是一种幸运，这是历史对我的眷爱。”

民俗，描述浓浓的乡愁

□ 陈莹莹

“当你进入民间文化这一领域后，就像有一把绳牵着你不由自主地往前走，让你有一大堆的问题想一探究竟。”

在俄罗斯选择研究生专业时，其他中国留学生往往选择研究普希金、高尔基、果戈理，刘魁立说了句“他们研究精英，我研究世俗”，毅然选择了民间文学。

1961年，学成归来在黑龙江大学任教的刘魁立，为考察全省范围内民间文学的蕴藏和流传情况，组织了多次采风。

宁古塔的朝鲜族老奶奶说，有一个勤劳朴实的人，做善事后仙人赠给他一件神奇的衣服，穿上它可以隐身，可以飞翔。地主老财知道以后，把衣服强抢了过去，要了起飞的口令。但在离地的那一刻，地主忘了问降落的口令，从此，贪婪的地主变成了一只乌鸦。

“多有意思！”扛着两个铁疙瘩的刘魁立听呆了。那是一台十几公斤重、有30年工龄的钢丝录音机和一个更沉的稳压器。他用长木杆抬着两个“宝贝”，一村一村地走访记录。回到祖国的他，用惊异和兴奋形容当时的感受。

“远离祖国的人，他对祖国的观念，除了包含父母、人民、土地、教育之外，还包括对风

